

关注赌博日益扩大的破坏力

英国赌博顾问公司H2 Gambling Capital从我国两个赌场及合法赌博网站所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包括游客和外地赌客在内，在新加坡赌博的人去年赌输金额高达99亿元，排在澳大利亚之后，澳洲去年赌博输掉的钱达234亿元。唯一的“好消息”是，去年我国成人居民在各类赌博中平均输了1189元，比起2010年两个赌场开幕时输去的1451元来得低，无论如何，按照人口来计算，新加坡人仍是全球第二大赌客。

我国成人居民输的钱超过一半是送缴给两个赌场，其余则在博彩、赌场外的老虎机及外国的赌博网站上输掉，如果把游客和外地赌客计算在内，平均每人输掉1964元。新加坡和澳洲一样赌业发达，合法博彩每个星期开奖五次，老虎机的密集度也很高，新加坡人爱赌，赌得越多，赌得越多，三年来在全球赌客排名上年排名第二，无疑给整个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

新加坡人在全球赌客排行中名列第二的一个因

素，是因为新加坡人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赌博方式。专门协助戒赌志愿团体也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沉迷赌博，无法偿还债务走投无路，必须寻求协助戒赌的赌客也告增加。戒赌志愿团体“晨曦社区关怀”主席王爱芬就告诉媒体，近年来越来越多赌徒向他们求助要戒赌，每个星期都有10到15个新的求助者。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NCPG）虽然没有追踪国人赌博所输掉的钱，但根据其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国人平均每个月的赌注是212元，每年花在赌博上的钱超过2500元。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赌博的破坏力已一再扩大，因禁令不得进入两家赌场的人，两年多来增加近三倍。截至去年11月30日，已开出的家庭禁令共有1624张，自我禁令共有13万9966张，第三方禁令有4万6208张。申请自我禁令的人当中，有九成是在新加坡

社论

2014年2月10日

工作的外籍人士，显示本地赌场也对外国人充满诱惑。两家赌场制造了就业机会，推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率，政府也从合法赌博税中得到了相当大笔的财政收入。但赌场也造成各种社会和家庭问题日益严重，助长了家庭暴力、犯罪和衍生精神疾病，整个社会必须提供更多的资源来帮助问题赌徒康复。截至去年11月的36个月内，税务局从赌博收取的总税额达70亿2200万元，平均每年超过23亿元，我们因赌博文化所付出的社会与经济代价，是否已超出政府从赌场得来的税收呢？澳洲嗜赌者人均年输2.1万澳元，澳洲每年为解决赌博问题付出的社会成本却高达47亿澳元。

政府在批准建国以来首两家赌场的开设后，马上出台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限制，虽然赌场给我国带来游客繁荣的景象，但国人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挑战。赌博并不能创造财富，赌徒依靠

的是运气，希望不劳而获，久而久之在贪婪的动机驱使下赌瘾成疾，因而各年龄层沉迷于赌博大有人在，每个病态赌徒都会连带影响家人的生活，政府也不时通过各种媒体引导嗜赌者破坏家庭的信息，华人新年期间更是频频给予忠告。

媒体也经常有类似报道，一些输钱的人常用诈骗的手段找钱满足赌瘾或偿还赌债，因而造成可悲的后果，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已变得越来越混淆，模糊不清，足见嗜赌已严重破坏社会和家庭架构及价值观。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赌博文化和风气在全国各处不断扩散，合法博彩的赌博方式也推陈出新，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来帮助沉陷在嗜赌恶习中，无力自拔的人。要减少嗜赌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政府或许应深入研究对病态赌徒的界定、病态嗜赌对家庭的伤害和社会的影响、社会须付出的代价、解决及应对方法等课题。

教育课题

王元丰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2014年全球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排行榜，除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香港大学MBA分列第14和29位外，来自中国内地的中欧商学院、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四所MBA也进入全球前100位，中欧商学院的MBA排名已是全球第17位。

在世界MBA的百强中，美国有50所大学上榜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英国12所入围排在第二位，中国大陆和香港共有六所学校（不计中国与其他国家合办的MBA课程）进入百强，多于加拿大的五所，位列第三位，这反映了中国MBA教育的进步。

这是让中国人高兴的消息，你会觉得中国的MBA的含金量也较高了。但是，如果你再看看2014年初爆出的哈尔滨理工大学MBA考试作弊的新闻，你又会觉得中国的MBA很烂。实际上，MBA这种源于美国专门培养中高级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硕士学位，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又存在诸如高低端发展差距大、不平衡，不少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高等等很多问题。

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深处迈进，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特别需要中国的MBA教育更上一层楼，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支撑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国MBA教育需要更高层次地改革、创新，进一步发展提高，使中国成为MBA教育的强国。

这首先需要中国大学思考MBA教育的指导思想。美国的一些高校在思考：MBA学生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客户？如果缴纳高额学费的MBA是学校的客户，学校应该怎样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学生读MBA就是想扩大人际关系，美国一些学校也要想着去为之服务。对于中国开展MBA教育大学必须摒弃的一个观念是：将MBA作为学校创收的渠道。持这样想法的学校是不可能办好MBA教育的，中国MBA教育鱼龙混杂的局面，与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有很大关系。进一步中国的大学需要思考：MBA教育在大学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中，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MBA教育仅仅是成人培训类的社会服务，或者带有些许人性质的成人教育？学校该怎样办好MBA教育，不但通过MBA教育实现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实际上，MBA教育对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管理等方面科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提出很多不同以往的要求。这些还需要中国的MBA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

MBA教育不是一般的成人培训

此外，对于MBA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等问题，特别需要中国大学研究思考。对于怎样办好MBA教育，美国和欧洲很多大学和企业以及社会上人士都在思考。MBA学生应该掌握哪些方面的技能，应该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互联网时代大学该以怎样的方式教学，才会有更好的效果？这些是世

中国聚焦

唐文方

个体户精神赞

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自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又于2014年拿到澳网冠军，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人在此项运动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李娜于2008年脱离国家队，成了一个自负盈亏的个体户，除了广告收入8%和奖金收入12%交给国家，剩下都是个人的合法收入。此举对长期习惯于“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实乃创举。

然而，此事却被媒体大为炒作，特别是西方媒体，把李娜描述成一个与中国的专制国家机器决裂的英雄，用“冲破”、“逃离”等词来形容李娜与政府的关系。

当李娜拿到法网和澳网冠军后，西方媒体欢呼雀跃，认为李娜的胜利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的胜利。今年1月2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李娜在澳网夺冠后故意没有答谢中国，而斯洛伐克的亚军则在致辞中感谢了她的国家好几遍，说明了李娜对中国的冷漠，1月28日《纽约时报》更是把李娜比作异见人士，说她对中国沉默实际上是专制的抗议。

李娜曾经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运动员，对政治并不想过多地卷入，尽

中国MBA要提高含金量

没有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是不可能办出高水平的MBA的。

界范围MBA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思考的教育理念问题：MBA教育不是一般的成人培训，完成学业的人将被授予硕士学位。因此，MBA教育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通过这种学术训练获得或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欧洲一些学校开展一年制MBA，笔者是持保留意见的。正像中国人不太认可欧美那种仅仅学习课程，就授予的硕士学位一样，中国的MBA要在大力增强MBA学生的学术训练上大下功夫！集中时间授课、利用假日上课，学生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这样能培养好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MBA教育案例教学当然重要，但案例教学的目的是系统学术训练的一部分，没有必要的知识基础，怎么能分析好案例？此外，中国大学实际上有非常大的空间，努力研究，通过不断探索走出有中国特色（中国案例）、有中国理论支撑的MBA教育之路。中国这方面的实践还远远不够。

还有，必须大力加强MBA的师资力量。没有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是不可能办出高

水平的MBA的。这次入围世界前100强的中国大陆的学校，都是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可惜，在中国举办MBA教育的200多所大学中，很多学校的教师水平并不令人满意。如果说现在这些大学教师的理论水平大体能够过关的话，那么，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是明显的短板。很多大学通过聘请校外其他大学和社会上的专家来授课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应该说在学费更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教学，外聘教师的方法基本解决了问题，但在普通的MBA教育上学校外聘教师的力度就没有这么大了，这也是导致MBA教育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之一。

另外，MBA教育的系统性较强，课程内容要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新，教师需要深入研究，才能上好所教课程。这样的要求不少外聘教师是做不到的。因此，中国大学确实要在培养专任MBA教师上下功夫，MBA教师不仅仅是博士毕业，要有较高的研究水平，还要有较深度参与企业工作实实在在的经验。培养这样的教师当然是需要经费的，可是有人在问MBA学生缴纳那么高的学费，不应该用在MBA教育上吗？

总之，中国MBA教育成绩不小，问题也很多，还要大力发展提高！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特约漫画 王锦松

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从为奖金打球，到开始更多地追求精神层面的目标，例如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生活得更更有意义，如何与人相处，如何爱与被爱等等。

李娜与她的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像西方媒体希望的那样冷漠，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她热爱自己的国家，盼望穿着中国队的球衣在奥运会上代表国家出战，甚至就是在澳网夺冠之后接受澳大利亚记者访问时，她还用英文说“I love my country!”（我爱我的祖国！）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媒体故意把这句话给屏蔽掉了。

哪怕是成了个体户，李娜身上仍然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元素，例如刻苦，面对同样教练的训练要求，西方球员能做到80%或90%就很不错了，而李娜却能做到100%。同样，在美国的学校，学生能完成老师交给的一半作业，老师就要表扬了，如果完成80%，那老师就要给学生磕头了。

再有，与西方有些球员不同，中国运动员除了鼓励，更需要教练的鞭策和指导。李娜与丹麦教练莫滕森合作的失败，也是因为莫滕森只会鼓励却不会鞭策和指导，这对于从小习惯于独立的西方人来说可能适合，但对于一个在集体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来

时事透视

丹尼·勒普齐格

日本是韩国的一面镜子

考虑到日本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我们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结日本二十年经济停滞的决心只能表示敬佩。他的战略——由大规模货币扩张、政府开支和结构性改革组成的“三支箭”——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他到目前为止只射出了一支箭。

刺激计划的效果因为旨在减少日本巨额债务负担而增加的消费税被抵消不少，提高消费税将令日本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能源领域、劳动力市场和竞争政策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还没有出炉，也似乎不会在近期实行。更令人担忧的，是难以改变的更大现实——如快速老龄化且不断减少的人口——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

但日本的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它的近邻和历史上的对头韩国，也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区别在于韩国可能仍有时间缓和这些趋势，并避免日本式的持久低增长和长期衰退的泥潭。

作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和过去50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韩国有可能面临暗淡未来的首要原因在于其人口。韩国的适龄工作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下降速度最快的。

韩国的低生育率原因很多，但两大经济因素十分明显。首先，家庭债务水平很高，吞噬了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其中最重的负担在于按揭贷款。房价/收入比比美国多出一倍以上。

其次，韩国家庭将收入的一大块（平均为10%）用于教育。考虑到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有4%（1988年为20%），韩国家庭增加支出的空间极为有限。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特征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之一——年龄介于30至39岁的女性只有33%在工作。这部分是因为与欧洲和美国相比，韩国人在育儿和工作之间更加难以取得平衡。

韩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比幼几中心排长龙的日本还低。此外，韩国在日间托儿中心方面投资不足，企业也很少提供这方面的帮助。韩国女性通常不会从事待遇优渥的工作，因此育儿服务对她们来说往往成本太高。

韩国还是有一些优势

韩国最近提高了退休年龄，但这对改善劳动力市场前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雇用了88%工人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的薪金远低于财阀（chaebols），中产阶级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

但相对于日本，韩国还是有一些优势。尽管政府的刺激政策提高了国家债务，但债务/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仍相对较低，约为37%。相比之下，日本的公债水平超过GDP的220%。

此外，尽管韩国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但国内消费也很强健。充足的研发支出及对领先科技创新的不断追求，为韩国带来了强劲的创新步伐。这有助于应对经济两大主要挑战之一：服务业的低生产力。

以目前情况来看，服务业的生产力比制造业低六倍。主导生产（如果不是就业的话）的韩国财阀的经营应该做出调整，以支撑日益重要的服务领域生产力的提高。

与日本一样，关键是增加服务业的竞争性。如果财阀继续自己包揽广告、融资和资讯科技等，就会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形成挤压。此外，韩国需要对产业集中度进行讨论，政府也应该提供激励、确保融资渠道和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来推动新领域中小企业的成长。增加高端服务岗位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也能大大地改善韩国的前景。

但是，从较长期看，韩国前景的关键在于劳动力。依赖比率的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50%，到那时，韩国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将达到36%——这可能有灾难性后果。医疗成本将上升，导致预算紧张。增加移民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压力，但会面对人民的反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韩国资本存量形势依然有利，潜在增长率也很可能回落到预期的2.5%年增长。

韩国从日本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教训。它夺走了许多日本出口市场；进口并改进日本的技术；采取了与日本类似的规划方法；其财阀也来自日本的财阀（zaibatsu）模式。

但是，韩国如今必须从日本的负面经验汲取教训。结构性改革不能拖。民族主义必须予以引导，以争取公众对深度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支持。

如果不能快速、果断地解决眼前的挑战，韩国领导人只要看看近在眼前的日本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

作者Danny Leipziger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教授。
 英文原稿：South Korea's Japanese Mirro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